

中華民國四年
舊曆歲次乙卯年

正月 大寒 雨水 立春 雨水 驚蟄 春分 清明 穀雨 立夏 小滿 芒種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處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正月 大寒 雨水 立春 雨水 驚蟄 春分 清明 穀雨 立夏 小滿 芒種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處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六月 小暑 大暑 立秋 處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都市、名妓与文人，三者之间如何互相阐释，相得益彰，乃叶凯蒂此书的

论述焦点。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于晚清上海名妓生活方式及文化意义的独到阐释。在叶凯蒂看来，这些名妓，作为「都市的大众之花与媒体明星」，在引领时尚的同时，也在塑造新一代的上海文人与都市风情。相对于大量使用图像资料这一外在特征，作者的基本立场更值得关注——不是记录女性受压迫的历史，而是接受这样一种可能：上海名妓主动地、创造性地利用新的环境，不知不觉间趟出了一条中国的城市现代文化之路。如此高调登场的「上海名妓」，不一定能被中国学界广泛接纳；但在政治史、社会史、文学史、媒体史以及性别研究的夹缝中，探讨如何看待迅速崛起的「娱乐文化」，这对于理解「现代都市」来说，绝对是个不可或缺的好视角。而作者的史学修养、读图能力以及生花妙笔，在本书中有很好的呈现。

● 陈平原

叶凯蒂在书中绘形绘影地展示了清末上海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还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吊诡之处。这是一部内涵丰富、引人入胜的作品，通过现代性这一新视角，使我们可以重新看待中国文人和青楼文化。

● 王德威

西曆一千九百十五年 至 十六年

正月 大寒 雨水 立春 雨水 驚蟄 春分 清明 穀雨 立夏 小滿 芒種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處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正月 大寒 雨水 立春 雨水 驚蟄 春分 清明 穀雨 立夏 小滿 芒種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處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六月 小暑 大暑 立秋 處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ISBN 978-7-108-05146-2



9 787108 051462 >

定价：48.00 元

叶凯蒂 著 · 杨可 译



SHANGHAI LOVE

Courtesans, Intellectuals,

& Entertainment Culture, 1850—1910

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
1850—1910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Copyright © 2006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 ~
1910 / (美) 叶凯蒂著；杨可译．—2 版．—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1
ISBN 978-7-108-0514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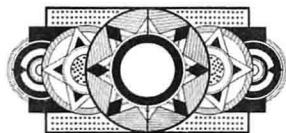
I. ①上… II. ①叶… ②杨… III. ①休闲娱乐—服
务业—史料—上海市—1850 ~ 1910 IV. ① F7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9665 号

特邀编辑 吴 彬
责任编辑 王 竞
装帧设计 朴 实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0-560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2 版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7
字 数 270 千字
印 数 07,001-10,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献
给

R



目 录

致谢	001
导言	003
1 秀摩登：19世纪末上海名妓的时尚、家具和举止	023
2 上海·爱：新的游戏规则	099
3 海上游戏场：重演《红楼梦》	140
4 形象打造者：洋场才子和上海的娱乐出版业	183
5 城市的大众之花和媒体明星	226
6 晚清绣像小说中上海名妓的形象	254
7 上海指南：城市身份形成过程中的娱乐业	312
8 结束语	352
注释	359
参考书目	398



致

谢

许多人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大力帮助。一切都缘起于 1988 年，当时我在中国做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定期与吴晓铃教授见面。有一次吴教授听到我对晚清青楼文化感兴趣，就拿出来许多他的私人藏书。他笑着告诉我，他可比郑振铎教授下手早，这些书五十年代初在东安市场的二手书店都找得到。多年以后，当我开始着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系统地搜集相关著述时才发现，这是极其珍贵、特别的一批藏书，有许多在任何大图书馆都找不到。在此我向已故的吴晓铃教授致以我最深挚的谢意。还有一些学者也非常慷慨地跟我分享了他们的材料，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南熙（Nancy Norton Tomasko）和海德堡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瓦格纳（Lothar Wagner），十分感谢他们惠允我使用其收藏的上海城市指南书。巴黎的狄瑞景（Régine Thiriez）为我提供了她珍藏的上海名妓的照片，还指点我如何进行照片分析。海德堡大学的克林格（Ingeborg Klinger）帮我翻拍了相关照片。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海德堡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友好地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帮助。

同时，感谢海德堡大学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结构与发展研究小组的成员，

本书原稿许多章节都经过了他们的讨论。他们的批评帮我理清了思路。还要感谢阅读全部手稿并提出评论意见的米特勒 (Barbara Mittler)、在最后成书阶段帮我整理手稿的金兰中 (Nanny Kim) 和库恩勒 (Holger Kühnle), 还有孙敏学 (Michael Schön) 也阅读、评论和校订了城市指南那一章。

很感激最后为本书提供了重要帮助的李欧梵和安克强, 他们耐心地阅读了我的全部手稿, 给出了详细、深刻的批评意见, 还纠正了很多错误。也要感谢为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做匿名评审的四位学者充满鼓励的丰富评论和建议, 以及为本书校订所做的工作。

本书中的许多章节都由会议论文发展而来。在此我也向巴黎的巴斯蒂 (Bastid-Bruguière) 表示感谢, 她邀请我参加了 1995 年度在法国加尔希 (Garchy) 举行的 20 世纪初中国文人文化中的西方思想研讨会。感谢白光华 (Charles Le Blanc) 教授邀请我参加蒙特利尔的欧美学者交流活动、贺麦晓 (Micheal Hockx) 邀请我参加莱顿举行的“20 世纪中国文学界”研讨会, 以及上海社科院邀请我参加城市研究研讨会, 我也因此得以与熊月之教授、罗苏文教授以及其他学者进行深入的讨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巴巴拉分校、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哈佛大学邀请我就我的研究发表演讲, 非常感谢他们。

本书的完成离不开各个基金会的慷慨支持。感谢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两年的资助, 还有德国研究基金会的“戏剧性” (Theatricality) 研究计划也支持了我三年的研究。“戏剧性”研究小组中的德国马堡大学的莫尼卡 (Monica Übelhör) 教授、柏林自由大学的费雪 (Erika Fischer-Lichte) 教授与我的激烈讨论引发了我的思考,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 我深深地感谢鲁道夫·瓦格纳 (Rudolf Wagner), 这些年来, 他总是第一个倾听我的所有想法, 第一个阅读全部章节, 并给予我爱和批评。



导 言

上海赛马盛事每年分春秋两季进行，1899年春赛期间，《游戏报》有这么一则报道：

昨日为赛马第二日，游人较第一日为盛，而各校书尤无不靓妆艳服驰骋于洋场十里间，足以游目骋怀，洵足乐也。

计是日林黛玉蓝缎珠边衫，坐四轮黑马车，马夫灰色绉纱短襖黑边草帽。陆兰芬湖色珠边衫，坐黑皮篷，马夫竹布号衣黑背心草帽。金小宝白地黑蝶花衣，坐黄色红轮马车，马夫湖色调号衣黑边草帽。张书玉蓝珠边衫，坐黑皮篷马车，同坐者为顾鹰，穿月白珠边衣，马夫各戴黑线凉帽穿鸭蛋色号衣。¹

这则报道详细地描写了前来看赛马的海上名妓，她们乘着宝马香车，在服饰和车骑上争奇斗艳，竞相展示时髦与豪奢，连她们的马夫也穿戴整齐，加入到了“秀场”之中。在19世纪末的上海，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和张书玉是第一流的名妓，她们的名字就是风尚和声望的象征。作为时尚风向标和公众人物，制造轰动就是她们的职责。

从很多方面来看，上面这个场景都非同一般。首先，上海的名妓可以十分高调地在租界招摇，再者，有关她们新发展起来的娱乐业以及她们在公共场所的一系列活动，居然报道于那时刚刚兴起的娱乐小报上，报道的口气就好像她们是上海的头面人物和主要风景。即使从大的历史层面来看，她们出现在公众前的姿态也的确令人惊讶。在大清帝国的其他任何地方，甚至帝都北京，女性几乎完全不准参与公共娱乐活动，妓女也不例外。所有女性都被排斥在公共空间之外。相比之下，这些光天化日之下乘马车参加时尚盛会的上海名妓就更不寻常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上海名妓可以随心所欲地展示她们的新行头？这需要什么社会条件？作为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女性，她们不但没有招来轻视，反而取代了后宫佳丽成为时尚先锋，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以前在其他城市里，妓女对女性时尚和社会行为也产生过重大影响，例如唐代的长安（618—907）、明代的南京（1368—1644）、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1420—1600）、幕府时期的江户（1603—1867）以及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1852—1870）。但是，妓女在其他地方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力，并不能解释为何当时上海名妓的曝光率如此之高，对大众品位的影响力如此之大，甚至震撼了城里的达官贵人。

自1870年代开始，上海的报纸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传播媒介慢慢从租界发展起来，晚清的名妓们也借报纸之力，树立了第一代“现代职业妇女”的形象，率先摆出了都会女性的姿态。她们的这些行为，从很多方面影响了后来民国时代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本研究的目标是进一步阐释19世纪晚期上海租界内的娱乐文化，正如上述场景所体现的，这是一种商业驱动的新兴文化；它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本研究考察的内容。我们要研究的三位主角便是城市、名妓和作为新阶级出现的城市知识分子，后者大多数都是中国的第一代记者。租界提供了市民文化、制度和法律环境，以及发展新的城市娱乐所需的经济基础。上海名妓则是一支最大胆的力量，推动着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她们把西方的物质器具引入到奢侈、休闲和欢愉的世界中来，

这些新玩意儿使她们的生活方式不复从前的低贱，反倒令人艳羡；她们对公共领域的谋求也有助于我们勾勒上海城市文化的轮廓。紧随其后的是文人群体，他们大多来自周边富庶的江南地区，在上海变成了第一代城市知识分子，重新定义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供职于发达的新闻出版业与教育业，是摩登时代的“形象制造者”（image maker）。上海城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形象”和“形象制造”有关，对当时的人来说，上海的新事物让人既惊且喜。为了调和这种矛盾，在对这座城市的叙述中人们找到了一个相应的符号，那就是租界独特的产物——上海名妓。

理解这种新型娱乐文化的方式之一，是研究这座城市和它所孕育出的名妓之间的共生和象征关系。然而，这样我们不就把聚焦点放在所谓的“边缘现象”和“边缘群体”上了吗？按照通常的理解，她们对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对近代中国在政治、社会 and 价值观上发生的巨大转变，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相关研究还只是建立在分析官方文件或是探讨政治、经济与文化精英行为的基础上。这种研究方法是否站得住脚是个观点问题，就我看来，由于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现实，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是否正确，还没得到充分的印证与肯定。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里存在着结构不平衡，才使得被王韬（1828—1897）称为“海上一隅”的边缘地区变成了这个巨大帝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动机。第二，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旅人都寓居在这里，由于上海道路交通委员会（后来的工部局）董事只是由外国商会成员兼任，不发薪、任期短，他们对德治和垄断专制都没什么兴趣，于是多元文化的边缘人社区开始逐渐融合，形成了一种混合的生活方式。第三，现代出版业发展迅猛，报纸、杂志等新兴媒体很快在全国都建立了发行渠道，因此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可以向外辐射出去。最后，在新兴的市民文化环境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边缘世界，它以妓女为核心，提供假装游戏、角色扮演等等选择。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旅人过客，同时，不需要借助什么鸿篇伟论或计划，上海书刊报纸上就会用各种惊人的报道和图片将这种“摩登”散布到全国各地。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边缘”似

乎并不是一个不好的称呼。上海的娱乐文化处于触手可及的、开放的公共空间中，一种现代而独特的都市感从底层发育起来，超越了那些政治家和革命者的宏论。

实际上，很多混乱而真实的现代化过程，恰恰可能就是在这里突生出来的——所以本研究关注上海租界中的城市娱乐文化，以及它对社会变革、文化变革的影响。可以说，上海娱乐这一概念及其内容是全新的、城市性的、现代性的、世界性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可以与巴黎这样的城市中心的发展相勾连，阿兰·科宾 (Alain Corbin) 曾经在其巴黎研究中称“休闲娱乐的到来”就在 1850 年。²

从 1860 年代到 1910 年代这五十年间，上海租界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逐渐占据关键的地理位置，扮演核心角色；它的商业活动、城市发展和生活方式都被后世所借鉴。虽然未必是全盘照搬，但这个模板始终在起作用，甚至在反对者身上也难免留下印记。研究娱乐文化会遇到多方面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主题的问题。一般来说，在考察都市文化时，无论从经济还是文化的角度，娱乐都很少成为关注对象。比起对政治家、改革家以及著名将士的研究来说，以娱乐作为学术研究的主题难免会令人担心是不是太没分量了。这种顾虑反映出人们对娱乐业从业者道德状况的忧虑。此外，在那些用来理解现实的各种学术话语和框架中，也很难给娱乐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它难以明确归类，在各种话语之间游荡。

从 19 世纪的官方文件中可以看出，娱乐业在经济上完全不重要，它既不涉及商品贸易，也不牵扯工业生产或者资本流动。上海租界的外国领事没有为娱乐设立单独的类别，虽然他们的季度报告细到每件进港出港的青花瓷器都要登记在案，但从来没提起过上海经济中这么重要的一个支脉。话说回来，即使是像伦敦、纽约、巴黎这些最古老的金融和工业中心今天也离不开娱乐业，得靠它广迎宾客，提升城市魅力。如今这几个城市中娱乐业都是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并且整个国家都以旅游娱乐业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令人头大的事实，并据此重新安排了工作重心。但是，据我所知，在城市史研究中，尤其是中国的

城市史研究中,娱乐业还没有得到相应的承认。一个绝佳的例子是施坚雅所编纂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引领着中国的城市研究,而“娱乐”这个字眼根本没列入索引。³

关于上海的研究有很多视角,对应着各不相同的假设:上海可以是改革的发动机,是了解现代中国的关键所在,也可以是帝国主义孤立的桥头堡,是工人运动之城,或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发源地。⁴此外,有些学者从行政管理、贸易、商业等角度来观察上海,把上海看成一个移民社会,或者把它当作在洋人到来之前就红火了几百年的商贸中心。⁵最近,有些学术著作开始关注上海普通人的日常生活。⁶这些研究的确在诸多方面推进了我们对上海历史和结构的理解,但令人吃惊的是,上海作为19世纪晚期中国最重要的娱乐中心的地位一直被忽视。事实上,上海城市形象的关键正是娱乐业,是它让各路金融巨子、往来客商慕名而来。

近年来这种情况有了一些可喜的改观。最近大量有关上海妓女的研究得以出版,这些内容翔实的作品当然也绕不开对娱乐业的讨论。以西方语言出版的有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Belles de Shanghai*, 1997),该书饶有趣味的主题和学术价值吸引了众多关注,其英译本*Prostitution and Sexuality in Shanghai*也于2001年问世。⁷贺萧(Gail Hershatter)出版了其作品《危险的愉悦》(*Dangerous Pleasure*),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Fin-de-Siècle Splendor*)中,专门用了一章来讨论晚清小说中上海青楼的内容。

史学家安克强的老师阿兰·科宾著有《供租用的女人:1850年后法国的娼妓业和性》(*Women for Hire: Prostitution and Sexuality in France after 1850*)。安克强继承了伟大的史学传统,以史学家的视角来处理上海妓女问题,他以严谨的文献材料,对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上海妓业管理相关的各种制度、权威和机构作了精妙的分析。比如,他细致地讨论了上海名妓从老城厢搬往租界的历史背景。这一搬迁始于1863年,主要都是在小刀会起事期间(1853—1855)。后来,那些为躲避太平天国之乱(1850—1864)而从江南各镇逃来的名妓们也加入了她们的行列。安克强画出了青

楼的地区分布图，考察了这些女子的年纪、地域背景、入行时间和脱离此业的时间。他所采用的材料既有公开出版的文献，也有法租界警方的原始数据，后者在“野鸡”方面的资料尤其丰富。

安克强主要的观点是：上海妓业的发展反映了性行为的重大变化——以前只是精英阶层的男性才享有包养名妓的特权，而现在变成了大众化的市场。自上海开埠以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狎妓行为“性”的含义和商品化的特征越来越浓。安克强主要采用了法租界警方的档案材料，希望给读者提供一个客观的说法。（对于那些道德上令人尴尬的研究主题，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科宾对巴黎卖淫业的研究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⁸此外，在安克强的分析中，我们也隐约可以感到，作者也试图从文化上来理解狎妓行为。⁹

对安先生大致的思路我很赞同，也从中受到了很多启发，但我自己的研究使我坚信，尽管新的都市妓业代替了旧式的名妓陪侍，在这个看似线性的过程中，上海租界还是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独特经历。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风头最劲的上海名妓，在空间、仪式、功能和社会意义上冲破了为传统妓女所框定的圈子，重新界定了她们与客人之间的关系，为自己积聚能量。作为强大、自信、面向公众的女艺人，她们真可谓“公众女性”。她们不断创造、捕捉这个繁华都会的精髓，最终成了它最骄傲的代表。

19世纪最后十年，当新的城市知识分子已经变得相当世故和尖刻的时候，他们描写这座城市及其名妓时才开始表现其纸醉金迷的一面。风月场的社会现实并没有变化，这里反映的不过是知识分子们态度的转变。翻阅1920年代的中文文献，例如《晶报》等小报，可以看到实际上青楼文化在“一战”之后仍然很流行。之所以有人说这种文化消失了，大概是因为1917年之后，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它不再被视为真正的娱乐，而变成了落后的传统。我的研究关注1870—1900年这一重要时间段里上海最一流的名妓。上海会聚了中国所有新鲜时髦的东西，仿佛一切皆有可能。

贺萧的《危险的愉悦》考察的历史时段与安克强相似。她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着手，对娼妓业作了细致的梳理和生动丰富的探讨。她将几位最红

的名妓的生平传记——连缀起来，替她们发出声音。贺萧的此项研究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名妓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涯的复杂互动关系，也增进了我们对她们与上海的关系的认识。当我们翻阅青楼的历史画卷时，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我受贺萧这本书的启发，开始追问一个问题：这些女子如何看待自己？又如何评价她们对于中国现代性的贡献？

在其他方面，我的研究路径与贺萧大不相同。贺萧关注的核心是将她们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中，讲述她们作为性工作者受到社会压迫和经济剥削的生活与劳动。她主要是从权力与控制的视角来处理这一主题的。从更广泛的时代背景来说，当时中国正在向现代国家迈进，民国政府几度试图规范和控制娼妓业。“在动荡不定的、事实上已经殖民化了的上海”，贺萧写道，社会上层人士更痛切地感受到“中国半殖民地状况之不稳定”。¹⁰ 因此，在娼妓问题上的大辩论，与中国（男性）精英对于主权脆弱的焦虑之情和界定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¹¹

我处理权力与控制问题的方式更为开放一些。聚焦于娱乐业和娱乐文化使我们更容易看到某些娱乐文化及其背后的人物是怎样影响社会变迁的。在这个剧本里，权力与控制并不是事先设定的。比如，对上海的娱乐文化及其改变社会的能量而言，中国政府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当然这种情况后来在民国时期有了一定的变化。因此，分析必须限制在特定的时间范围之内。我特别要指出的是，贺萧所说的“男性的焦虑”有特定的时间性，在 20 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之前没有这个。当然，在它形成之前有个雏形，就是 1870 年代以来新到上海的文人身份认同的焦虑。这种焦虑感与主权和民族地位关系不大，倒是跟租界毫不掩饰的商品精神联系更深。我的分析展现了这些男子描述狎妓和城市的方式是如何变化的，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自我认知和心态的变迁。

王德威在他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中新论》中也谈到了我在本书中讨论的几本小说。这些书 20 世纪初在上海出版，以上海名妓为主人公。王德威的论述从一种“五四”作家和文学史作家中流行的说法展开：直到 1920 年代一批小说家以新白话文写作之后，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才

开始出现。由于这个广为人知的说法，王德威书中所讨论的晚清小说中的现代感也就变成了“被压抑的现代性”了。晚清名妓小说中的现代性，体现在她们对于爱情王国的重新定义，以及她们对情与色的超越与反讽。这些小说常描写性事和欲望，初看上去给人的印象颇为颓废，但这正是掩饰在“狭邪”（waywardness）的面具之下的新行为规范。“狭邪”这个词来自鲁迅（1881—1936），中国小说史早期最著名的作家。王德威认为，与明显以西方小说为样板的“五四”小说不同，晚清小说独特的现代性基本上产生于中国内部的文化进程。不能用线性的发展模式来理解现代性。现代性并非先产生于某一处，然后其他地方接着发生“后起现代性”（belated moderns）。在王德威看来，“在任何特定历史节点，现代性的到来都是各种新的可能性激烈竞争的结果。”¹² 没错，19世纪的现代性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形态，但我还是发现，有很多甚至是压倒多数的材料表明，这些小说的作者从很多方面来看都非常全球化。他们的小说在杂志、报纸等西式媒体上连载，而且这些作者大部分都是这些媒体机构的记者。他们搬到上海去就是因为它是中国的“西方”，他们在小说中也出现了真正现代的虚拟主角——作为大城市和大都会的上海。他们是当时世界时尚的一部分。时尚是多变的，但它有一些核心特征，各个都会城市对它加以吸收和改造，只是有一些时差而已。说到小说主要的人物——上海名妓，情况也是一样，其形象与人们对传统名妓的理解大相径庭，倒是积极地吸收了许多世界性的时尚元素和奇思妙想。通过上海的名妓们，西方现代的玩意儿不知不觉地成了天堂的室内装饰的一部分。她们没有高唱现代化的调子，但其巨大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尤其是考虑到她们从未试图说服他人。王德威提到了这些小说，尤其是《海上花列传》所描写的新城市中心的重要性，但他的分析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

我的研究直接受到了王德威的影响，他指出，晚清小说里的名妓“可能充分地预示着192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思想叛逆、行为出格的‘新女性’形象”的出现。¹³ 尽管他没有对此深加讨论，但这无疑是大胆而深刻的洞见。同样，从比喻和文学的意义上来说，上海这座城市和它孕育出的“新女性”之间的重要关联也不是虚构的。王德威强调上海和上海名妓之间的

关系，主要是把后者当成欲望的呈现。¹⁴ 如果我们把狭邪小说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欲望只是作者们遮掩上海的无耻荒淫的熟悉的外衣。所有的狭邪小说共有的一个基本结构就是这座城市。从这一角度来看，从鲁迅的道德立场立论到王德威从叙事创新着眼，对这类小说的批评脱离不了人们对于“上海究竟代表什么”这一问题的理解。¹⁵ 我的研究集中于作为文学形象的上海和上海名妓之间的关系。作为小说主导元素的场域 (locale) 兴起、指向都市中心的象征主义都意味着现代的到来。

有关上海娼妓业的著作还有孙国群的《旧上海娼妓秘史》和薛理勇的《上海妓女史》。尽管两部作品材料都很丰富，但在文献应用上都有所不足，反映出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形式上还是更像趣闻轶事而非学术研究。孙国群的著作是首批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的妓女研究之一，但她没有和国家的宏大叙述保持适当的距离，没有脱离所谓卖淫邪恶的假设。因此，她对历史的讨论也按照揭露女性如何受资本主义剥削的路线去展开。薛理勇曾经发表过一篇有关上海妓女的论文，他认为上海名妓是上海不断发展的商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上海城市文化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幸的是，这个蕴含重大潜力的研究有不少事实上的错误，作者的一些议论也缺乏历史文献的支持。

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以其城市社会史、性别研究和文学象征等视角大大增进了我们对于上海名妓的了解。与这些作品进行了对话后，我考察了如今仍无人问津的史料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本研究力求回答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表现 19 世纪晚期，尤其是 19 世纪晚期的上海时，上海名妓的形象无所不在？这一联系是如何表现和反映她所能产生的特殊影响的？这种影响对于新型都市娱乐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形成来说极为重要。在这一新兴的移民地区中，人们建构起了新的文化身份认同，东方和西方的事物也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了一起。

本书采用阐释学的文化史研究方法，不忽视各种文献的类型局限和媒体意涵，不偏重任何一种文献，以多种文献互相参校印证。本书希望运用这些文献自身的词汇来解读这个曾经存在过的鲜活的意义世界，同时，本

书也提供了当代的概念和视角以发掘文献的多重意义，虽然原作者对此未必有清楚的认识。

这一研究方法并不聚焦于可证的史实，而认为上海和上海名妓的形象与这个实实在在的 (actual) 城市和人群一样是真实 (real) 而有力的存在，甚至比后者更甚。这一研究法认为，描写和叙述不是仅建基于作家的想象和主观动机的、对现实的简单建构，虚构的作品也可能以广泛的准社会学观察为基础，而关于名妓生平的现实主义描写大概也与男性作家私底下的自我反思相交织。本研究的目的不是记录女性受压迫的历史，而是接受这样一种可能：上海名妓主动地、创造性地利用新的环境，不知不觉间趟出了一条中国的城市现代文化之路，这可比维新派大人物们唱高调奏效多了。

历史背景与娱乐业的兴起

第一次鸦片战争导致了《南京条约》的签订，根据《南京条约》的约定，1841年在黄浦江的河滩上建立起了上海租界。当时与“上海”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还只是比较偏南的老县城，租界——包括由英国人和美国人管理的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都和上海老县城隔着一江，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当不同背景的人们带着各自的憧憬与期望来到租界，甚至逃向租界的时候，他们对于未来的城市面貌的想象不受任何旧框框的限制，无论在实际上、在想象中，还是就传统的权力关系来说都是如此。因此，他们也就以一种果决的方式影响这座城市的发展之路。

自从1860年代早期开始，西方人就开始采用“模范租界”(model settlement)来指称这一地区，尽管它的含义从来没有被清晰地界定过，但从其上下文来看它意味着不同种族之间关系和睦、秩序文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得到了不错的平衡。¹⁶租界中的居民也为其生气勃勃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活动感到自豪。正如上海的一位老居民在20世纪初所写：“上海的娱乐业比任何别的通商口岸都发达，我们应该引以为豪。”¹⁷

1850年代晚期，为了躲避太平天国的战乱，很多富有的中国人涌入了